

中國報學史

戈公振著

中国报学史

戈公振著

中国新闻出版社

一九八五年·北京



作 者 像

RA067/06

重 版 说 明

戈公振先生的《中国报学史》，写成于1926年6月，出版于1927年11月，是中国第一部系统叙述中国报刊历史的著作。

戈公振在中国新闻史研究领域作了开创性的工作，首次确立报刊史的研究是一门学问，并为后人的继续深入研究提供了大量第一手资料 and 重要线索。《中国报学史》作为文化史范畴的第一部报刊史专著，也是研究中国文化思想史的一部重要参考书。该书的学术价值和书中所体现出来的作者鲜明的爱国主义立场和民主主义思想，为整个旧中国的其它新闻史著作所难企及。该书自出版以来，一直风行不衰，影响中外。

《中国报学史》虽然在解放前四次再版，1955年又由三联书店出版过，但这些旧版本目前已很难找到。为了促进中国新闻业史研究，满足读者学习和研究的需要，我社将该书重新出版。

新版本与以往版本的不同之处是：

由原来的繁体字竖排，改为简体字横排，以适合今天读者的阅读习惯，并纠正了旧版本的排印错误。

戈先生的侄儿戈宝权同志重新为该书撰写了前言，介绍了戈公振其人和《中国报学史》的成书过程。

杨瑾琤、宁树藩、方汉奇、王凤超同志撰写了《〈中国报学史〉史实订误》，对已发现的书中史实错误和不准确之处，就目前掌握的资料，作了第一次比较系统的订正，附于书末，供读者参考。

本书重版时，除由于横排版原因，不得不对个别字作更动外，一律保持初版时原貌。

参加本书编辑工作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的岳颂东、
阎希同、王凤超。最后由戈宝权、王凤超负责定稿。

中国新闻出版社

一九八五年四月

谈戈公振和他的《中国报学史》

——写在《中国报学史》重印本的卷首

戈宝权

早在六十年前，也就是在一九二五年的夏天，我的叔父戈公振开始撰写他关于新闻学的重要研究著作《中国报学史》。这本书最初于一九二七年十一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第二年十月再版，一九三一年五月三版，到了一九三五年一月又出版了国难后^①第一版，以后即未曾再印过。建国后一九五五年，我曾应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之请，对这本书进行过一次整理，于当年三月出版了三联版，转眼这也已三十年前的事了。此外，据我所知，香港的太平书店曾于一九六四年翻印过这本书；台北的台湾学生书店也曾在一九四六年影印过这本书，一九八二年已出到第四版。由于这本书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论述中国报纸历史的著作，史料非常丰富，至今仍有参考价值。今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是我的叔父戈公振诞生的九十五周年，十月二十二日又是他逝世五十周年的忌辰，中国新闻出版社决定重印这本书作为纪念，现特在重印本的卷首写几句话，谈谈有关作者的生平和《中国报学史》这本书是如何写成的。

我的叔父戈公振（1890—1935），是我国二十年代前后和三十

^① “国难”指一九三二年“一·二八”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而言，当时在上海闸北宝山路的商务印书馆毁于日军炮火。

年代初著名的爱国进步新闻记者、新闻学者、中国新闻学史和世界各国报业史的研究者。他在一九一四年参加了《时报》编辑部的工作以后，就决定终生献身于新闻事业。对于他来说，这既是一条漫长而又曲折的道路，同时也是一条在思想上探索和发展的道路。他从《时报》起步，其间经过了《申报》，一直发展到走向筹备创办《生活日报》的阶段，在这二十多年当中，他除了从事报纸的编辑和采访工作之外，还又专心研究新闻和新闻学史（他称之为“报学”和“报学史”），在这方面写了很多论著，作出了不小的贡献。

他于清光绪十六年（1890年）阴历十月十六日（公历十一月二十七），诞生在江苏省苏北的东台县城一个所谓“世代书香”的读书人家。他原名戈绍发，字春霆，号公振，但“公振”这个号，却成为他后来从事新闻工作和使他闻名的一个名字了。

童年时，他曾在家乡由伯祖母翟太夫人创办的弢庵学塾读书，一九〇七年以优等生毕业于东台高等学堂。一九一二年他参加过《东台日报》的工作，担任图画编辑。一九一三年毕业于东台淮南法政学校后，即于当年冬天去上海，进了有正书局当学徒，先后在图画部和出版部刻苦工作和学习。有正书局是由早年留学日本和抱有革命进步思想的狄楚青创办的，他同时又创办了《时报》。由于在工作上得到狄楚青的器重，我的叔父在第二年当他二十四岁时，即被调到《时报》编辑部，最初担任校对，助编，编辑，最后一直升任总编辑。他在《时报》前后一共工作了十五年之久，对报纸的革新作了大量的工作，创办了多种副刊，并首创了《图画时报》。在《时报》工作期间，他就开始研究新闻学。一九二四年他编译了他的第一本关于新闻学的书《新闻学撮要》（一九二五年二月初版，一九二九年二月再版），梁启超曾为这本书写了序文，其中说：“戈君从事《时报》十有四年，独能虚心研究及此。予喜其能重视其职业，与此书之有裨后来者也，爰为之序。”一九二五年夏他在上海国民大学任教，讲授中国报学史，同时并在上海南方大

学、厦大、复旦大学等校讲授新闻学，此外还发起组织了上海报学社，举办了新闻学学习班，培养和教育新闻人才。

一九二七年初，他靠了个人的积蓄第一次出国访问，先后到了西欧的法国、瑞士、德国、意大利和英国等国，后又去美国和日本，考察这些国家的新闻事业。他对各国报馆的组织与经营，通讯社的创办与业务，报纸的印刷技术，剪报资料的储藏，直到街头的新闻橱窗和售报亭等，他无一不关心注意。一九二七年八月他曾应国际联盟的邀请，出席了在日内瓦召开的国际新闻专家会议及其它一些会议。一九二八年五月，又参加了在德国科隆城举行的世界报纸博览会的活动。在国外访问期间，他还为国内的报刊写了关于参观英国《泰晤士报》、路透通讯社、美国《纽约时报》和《芝加哥论坛报》的通信文字。一九二八年底回国，旋即参加了《申报》的工作，任总管理处设计部的副主任。这时他开始撰写《世界报业考察记》，并于一九三〇年创办了《申报画报》。

三十年代初，特别是在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和一九三二年“一·二八”淞沪战争之后，他的思想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开始阅读有关马列主义的著作和研究苏联的书籍；同时愤于国难当头，积极投身到抗日救国的运动中去。这时他和《生活》周刊的主编邹韬奋等人筹备创办代表民众喉舌的《生活日报》，可惜这个报纸因为国民党反动派的压迫和阻挠未能出版。恰好这时国际联盟派了李敦调查团前来我国，调查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的侵犯东北和进攻上海的事件。他冒着生命危险随调查团同去东北。他预感到这次到东北可能遭到不幸，临离北京前就写好了遗书。他在到达沈阳后不久，即为日伪军警拘捕，后经调查团交涉方获释放。从东北回来之后，他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到东北调查后，据我个人粗浅的观察，除非举国一致，背城借一，不但东北无收回的希望，而且华北也要陷于极危险的地位。事实如此，并非我危言耸听。”当年九月，他又去日内瓦，参加国际联盟举行的有关日本侵略中国问题的特别大会。

会议结束后，适当中苏两国在日内瓦宣布恢复邦交，他即于一九三三年三月随我国第一任驻苏大使颜惠庆前往苏联。他原想只是“过路性质”、“走马看花”而已，孰知一留就将近三年，其间还曾在当年十一月前往西班牙首都马德里，出席参加国际联盟在当地召开的国际新闻专家会议。他在苏联居留期间，潜心研究苏联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方面的情况，他甚至建议将苏联一名词译为“庶联”，他曾这样解释说：“Soviet Union通常译为苏联，苏字译音无意，故我改为译庶，‘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俄以Proletarian（无产阶级）政治相号召，凡是赞同此种主义者，均可加入为联邦之一。称为庶联，似乎音义两方面都能顾到而比较容易了解。”^①这三年也是他的思想上迅速发展和成长的年代，邹韬奋曾指出他当时“对世界大势的辛勤的观察研究，在正确认识上的迈进”，并且说：“我在莫斯科时和他作数次长谈，深感到他的猛烈进步”。^②在这三年当中，他除常住莫斯科外，还曾先后到过列宁格勒、哈尔科夫、第聂伯、罗斯托夫、巴库、乌拉尔一带，以及中亚细亚的乌兹别克、西伯利亚和远东等地参观，写成了《社会城》、《谷城》、《电城》、《油城》、《碱城和铁城》等多篇通讯文字，报道了苏联在第二个五年计划中国家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建设情况。

我的叔父戈公振和邹韬奋是有着深厚的友谊的。早在“一·二八”前后时，他们就筹划着出版《生活日报》，可惜这一计划未能实现。他在一九三二年十月二日从日内瓦写给邹韬奋的信中还说：

“弟对于国事实抱无上悲观，但吾人既稍有知识，只有尽国民一份子责任，从自己奋斗起。《生活日报》筹备事，使兄偏劳，心实不安。弟身虽远，此心实悬念也。”^③一九三五年夏，国难日深，邹韬奋曾电邀他早日回国，重新筹办《生活日报》，他立即启程返国。当他临终时还告诉邹韬奋：“在俄国有许多朋友劝我不必回

① 见戈公振写的通信《从日内瓦到莫斯科》。

② 见邹韬奋：《悼戈公振先生》。

③ 这封信曾以《途中的中国代表团》为题发表在《生活》周刊上。

来，……国势垂危至此，我是中国人，当然要回来参加抵抗侵略者的工作……”^①从这些话中，就可以看出他对祖国的热爱和对抗救国事业的关切。他于当年十月十五日返抵上海，旋即病倒，因盲肠炎与腹膜炎开刀，不幸于十月二十二日长逝，享年四十五岁。关于他的死因，多年来始终是个谜。

在我的叔父遗留下的著作中，最早有他在《时报》工作时编辑的一本《中国图案集》，由有正书局出版。在新闻学的论著方面，有《新闻学撮要》、《中国报学史》、《世界报业考察记》（未出版，原稿毁于“一·二八”战争的炮火）。《新闻学》（此书原为《万有文库》所写，成于一九三一年，后经家叔戈绍龙整理，于一九四〇年四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一九四七年二月再版）。他在苏联访问期间写的通讯，曾由邹韬奋编辑成书，题名为《从东北到苏联》，于一九三五年十二月由上海生活书店出版；此书不久前又经我整编，于一九八四年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列为《现代中国人看世界》丛书之一。

二

现在来谈谈我的叔父戈公振是如何撰写《中国报学史》的。他在一九二六年六月为《中国报学史》写的《自序》一开头就说：

民国十四年夏，国民大学成立，延予讲《中国报学史》。予维报学（Journalism）一名词，在欧美亦甚新颖，其在我国，则更无成书可考。无已，姑取关于报纸之掌故与事实，附以己见，编次为书。时未越岁，已衰然成疾矣。

这本原达四百六十多面，字数将近三十万字的巨著，于一九二七年十一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那已是在他第一次出国之后的

^① 见邹韬奋：《悼戈公振先生》。

第十个月的事了。全书共包括（一）绪论，（二）官报独占时期，（三）外报创始时期，（四）民报勃兴时期，（五）民国成立以后，（六）报界之现状等六大章。书名曾为《中国报学史》，实际上是本泛论新闻学和我国新闻发展史的书。这本书出版后，立即获得好评，如一位署名为“素痴”的作者，曾于一九二八年四月十日在《大公报》文学周刊写的《评戈公振中国报学史》一文中就说：

中国报学史一册，东台戈公振著，商务印书馆出版，定价三元。此书搜讨之勤，网罗之富，实为近来著作中之所罕见者。……此书不独可使报界中人明本业之掌故，其第二（指“官报独占时期”），第三（指“外报创始时期”）及第四章（指“民报勃兴时期”）可补史乘。后二章第三及第四章更可为近世史料一部分之目录，然其遗漏舛误之处亦所不免。

接着他即就（一）资料之待补者和（二）疏谬之待正者，提出了些意见。此外，还有一些人对《中国报学史》提供了补充和改正的材料。这本书也常被外国的研究者和学者所引用。日本人小林保曾把它翻译为日文，改名为《支那新闻学史》，于一九四三年二月由东京人文阁出版，列为《支那文化丛书》之一。译者并在序文中指出：“著者戈公振，……就他的经历表明，他在中国是近代新闻界的第一人，作为实际家同时又作为新闻学的系统研究家，享有很高的名声。”

《中国报学史》这本专著，是我的叔父积累了多年收集的史料和研究才写的。据他告诉我，他为了写作这本书，常向私家藏书和图书馆借阅书籍，并经常到徐家汇天主教堂的藏书楼（现上海图书馆徐家汇藏书楼）去查阅报刊资料。他还曾向不少人请教，如马良（相伯）在复信中说：

公振先生大鉴：敬复者，承问敬悉。……中国报纸之源流见《圣武记》。

又如丁福保复信说：

公振先生撰席，奉读手教。……先生拟编中国新闻小史，甚盼早日成书，得以快睹。窃以中国报纸，实滥觞于汉唐邸报。曾见孙樵集中，有读《开元杂报》一篇，尤为今日报纸之权舆。福保寡学肤受，有忝下问。谨检赠孙集一册，于中读《开元杂报》一则，可资尊著材料者，聊以塞命。

再如郑振铎的复信说：

“公振先生：来示敬悉。关于元代事，弟知者极少。先生如看《元秘史》、《辍耕录》之类，想必可有所得。涵芬楼秘籍，你如要，请于便时来取。其中元人杂记并不多。

从这几封信来看，他请教的问题，都与研究汉、唐、宋、元各代的“邸报”有关。

为了研究清代以来外国人创办的报刊以及我国某几个省出版的报纸，他曾在《时报》上刊登了《访求旧报》的广告：

海内旧家如藏有下列老报 或知其藏于何处请示知 当从伏酬谢
西洋考每月统记传(马礼逊编 广州出)天下新闻(麦都思编 马六甲出)
特选撮要(麦都思编 巴达维亚出)察世俗每月统记传(米怜编 马六甲出)
昭文新报(艾小梅编 汉口出)福报(福州出)汉报(汉口出)湘报(长沙出)

记得他还写过信给蒋光赤，请他帮助调查俄国人在哈尔滨和上海等地创办的俄文报纸，我曾看见过蒋光赤的复信。

此外，如我们有位在北京工作的亲戚杨仲华，曾把清代出版的《京报》和附印的《宫门抄》寄给他，在用活字印刷的《宫门抄》，有一条“十月二十九日，召见军机 戈炳琦”的记载。还有清代出版的《谕折汇存》是蒋震泉寄赠的，《官书局汇报》是王小

隐寄赠的。清代出版的《京报》，长六寸，宽三寸，封面是黄纸红字，他曾按照原样制成套色版，附印在《中国报学史》中。我的叔父还告诉我，《中国报学史》的封面，是他亲自设计的，封面采用黄布面，靠左上角写着“中国报学史”五个红字，中下方的小方框里写着“戈公振著”，就是模仿“集文报房”出版的《京报》的封面的形式。

自从《中国报学史》出版以后，他还是在不断地搜集材料，甚至在国外访问时也没有忘记这一工作。他在巴黎访问过法国国家图书馆的东方藏书部；一九二七年底到了英国时，又专心在大英博物院的东方图书室查阅藏书，终于见到了他在撰写《中国报学史》时曾经登广告征求过的几种外国人创办的中文报刊，即如清嘉庆年间出版的《察世俗每月统记传》、道光年间出版的《特选撮要每月统记传》、《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同治年间在美国出版的《旧金山唐人新闻纸》等，并写成了《英京读书记》一文，对《中国报学史》中的第三章《外报创始时期》作了补充。他在文前这样写道：

我国向未视报章为一种著述，且日久则卷帙浩繁，非有大厦，度藏实难。故予纂《中国报学史》时，有若干种只存其名而未见其书，中心憾之。我国现代报纸之产生，系发端于英人，比来伦敦，于英国博物院藏书目录中，果获曩日遍访而未得之定期出版物多种，爰撮大要，以足吾书，兼以饷治报学者快睹焉。

由于当时照相术还不很发达，更没有今天的影印设备，他曾将这些报刊摄玻璃底片，并记录在笔记中，从他当年遗留下来的一本笔记本，即可见一斑。

三

在我的叔父生前，《中国报学史》共出版过四版，他常想把他新发现的史料增补进去，并同时用白话来改写全书，使它成为一本

通俗的读物，但他的这个愿望始终未能实现。他在临终的遗言中，曾这样告诉韬奋：

我的著作……《报学史》原想用白话改写，现在要请你叫宝权替我用白话完全写过……。关于苏联的视察记，大部分已做好……也叫宝权接下去……。还有关于世界报业考察记，材料都已备，可惜还未写出来……现在只好随它去了……①

多年来，由于种种原因，我也无法实现他的遗愿。首先当他逝世时，我正在苏联任《大公报》的驻苏记者；及至一九三七年“七七”抗战爆发，我从苏联返回后，即在汉口和重庆的《新华日报》工作，我的叔父生前搜集的书籍和资料，当上海成为“孤岛”时，都寄存在徐家汇的天主教堂，我直到五十年代后期才初次见到这些遗物。其次，建国以后，由于工作关系我经常来往于国内外各地，不可能来钻研他的遗著和遗物。三来，他遗留下来的资料很多都是断简残篇，片言只语，不易编整成文。再加以我的学识和能力都有限，也不能完成用白话改写《中国报学史》的任务。我曾和我的三叔戈绍龙研究过，他认为用白话改写《中国报学史》一书，“当然不易，也不必这样做。”只有在一九五五年我才将他的这本《中国报学史》稍加整编，并写了前言重版出书。至于他写的有关苏联的视察记即《从东北到苏联》一书，在一九八三年七月也经我整编过，作为新版出书。

我的叔父写的这本《中国报学史》，系成于六十年前，当时他还没有接触到马列主义，当然也不可能用马列主义的观点来写这本书，同时在不少论点上也不一定就正确；再加以他撰写这本书时，可能由于政治上的原因，对二十年代出版的左翼报刊很少涉及，这也是一个缺点。《中国报学史》这本书在某种意义上也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就是对中国新闻事业的历史提供了丰富的史料，但在

① 见邹韬奋：《悼戈公振先生》。

阅读时，只能用分析的眼光把它当作史料作参考。

近年来，研究戈公振和他的《中国报学史》的人不断涌现。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的王凤超同志，曾为《新闻界人物》第一辑（一九八三年新华出版社出版）撰写了关于戈公振的专文，其中指出：“作为一名新闻记者，他能忠于客观事实；作为一个新闻业史研究者，他对一些历史事实，敢于秉笔直书；作为一个严谨的学者，促使他广泛涉猎和研究世界许多国家新闻事业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这就使戈公振能够成为循着时代潮流前进，不断追求思想进步的新闻名将。”他还指出，戈公振撰写的《中国报学史》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叙述中国报纸（包括中国最初的新闻事业）历史的著作，奠定了他在中国新闻业史研究中拓荒者的地位，”同时也指出了这本著作中的一些缺点。又如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的杨瑞琤、宁树藩两位同志，曾对《中国报学史》中的一些史料的错误作了勘误。一九八一年出版的方汉奇著的《中国近代报刊史》和最近看到广西人民出版社新出了由梁家禄、钟紫、赵玉明、韩松四人编写的《中国新闻业史》（从古代至一九四九年），我很希望这些新著，能成为对《中国报学史》一书的补充，把我的叔父戈公振生前未能完成的遗愿更加深入地继续和发展下去！

目 次

重版说明

谈戈公振和他的《中国报学史》.....戈宝权

——写在《中国报学史》重印本的卷首

自 序..... 1

第一章 绪 论..... 3

第一节 报学史之定名..... 3

第二节 报纸之定义..... 3

第三节 本书编辑之方法..... 18

第二章 官报独占时期..... 20

第一节 “邸报”名称之由来..... 21

第二节 汉有“邸报”乎..... 22

第三节 “邸报”见于集部之始..... 23

第四节 唐代“邸报”之一斑..... 24

第五节 宋代“邸报”之一斑..... 25

第六节 “邸报”见于史册之始..... 26

第七节 小报与新闻..... 27

第八节 元初之“邸报”..... 27

第九节 禁止传报之无益..... 28

第十节 “邸报”用活字之始..... 28

第十一节 《京报》..... 29

第十二节 传抄伪稿案..... 30

第十三节 所谓《塘报》与《良乡报》..... 35

第十四节 请刊“邸报”之受斥..... 35

第十五节 太平天国之办报条陈..... 36

第十六节 西士关于官报之建议..... 37

第十七节 《官书局报》与《官书局汇报》	37
第十八节 《时务官报》	38
第十九节 官报全盛时期	40
第二十节 《政府公报》	50
第二十一节 结论	52
第三章 外报创始时期	55
第一节 外报之种类	55
第二节 当时报界之情形	83
第三节 当时国人对外报之态度	86
第四节 外报对于中国文化之影响	89
第五节 结论	93
第四章 民报勃兴时期	95
第一节 日报之先导	99
第二节 《中外纪闻》与《强学报》	101
第三节 杂志之勃兴	103
第四节 《国闻报》《时务日报》与《时报》	116
第五节 鼓吹革命之健者	126
第六节 留学界之出版物	134
第七节 提倡阅报与禁止阅报	139
第八节 君宪民主之论战	140
第九节 清末报纸之厄运	142
第十节 结论	146
第五章 民国成立以后	147
第一节 两度帝制之倏现	149
第二节 杂志	152
第三节 国内外会议与我国报界	158
第四节 结论	161
第六章 报界之现状	164
第一节 报馆之组织	164
第二节 新闻	166
第三节 广告	174
第四节 发行	184